
民族地区文化景观设计研究

——以云南独龙江人马驿道为例

张建国，张熹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近年来，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的城镇景观营造呈现出一种审美的病态化倾向，究其本质是地域性文化在设计过程中的缺位，特别是在民族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对于当代城镇景观营造文化的研究迫在眉睫；同时，新的历史语境下相对于传统的设计研究有必要开拓新的理论视角，文章将文化景观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引入城镇景观设计之中，对景观的文化性内涵进行探讨，并结合云南独龙江人马驿道的景观设计，总结提出“四步合一”的地域文化景观营造策略，即“历史文化元素的提取与景观要素的文化意蕴挖掘”“历史图景与当代功能需求的协调与重构”“文化景观系统的组织与提炼”与“景观空间叙事结构的展现设计”。

【关键词】文化景观；民族地区；景观设计；人马驿道

【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7)05-0101-08

一、当代城市景观营造的困境

城镇景观空间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承载，传承了千年的民族文化，在不同地理区域与文化语境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类型，是地域人文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结晶与表现。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化、初始化、现代性与消费社会”是时代的语境，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加快，我国城镇景观正在受到严重的破坏。不仅在大城市，在民族地区，由于村庄建设的日益“城市化”，传统的乡村景观形态也受到了城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城镇景观正处于重构的历史时期。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随处可见的“现代”性景观成为我们城市营造的主题。西方强势景观文化借助全球化的强大推力，使中国固有的景观话语与言说形式受到严峻的挑战，并使其逐渐边缘化。特别是在 80 年代以来，受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如“文脉主义”“符号学图论”与“解构主义”等，中国设计师的创作开始出现两极化趋势。一部分设计师为追求现代性，完全放弃地域文化；另一部分设计师将各种传统景观符号化、片段化地进行杂糅，在追求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反而造成了地域性的丧失。

收稿日期：2017-04-21

基金项目：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培育项目“当代艺术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城市景观设计研究：以云南为例”（KKS201655052）

作者简介：张建国（1974—），男，讲师，主要从事地域性景观设计研究。

在这样一个“景观社会（Spectacle）”中，城市的空间与物质形态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功能与存在意义，成为一种外在的符号。在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刺激下，“非线性”“表皮主义”“仿生”等各种新潮的设计语汇层出不穷，成为这种外在符号的合法性外壳，为设计师、开发商以及大众媒体极力追捧的对象。在建筑市场化竞争的过程中，经过商业包装，一大批所谓“先锋”的新奇景观在华夏大地上拔地而起。“万象不过一景”，我们城镇景观的传统文脉在逐渐丧失，究其本质，这是一种“文化趋同”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城镇景观营造得了“失语症”^[1]。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也提出了“不要再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的口号，城镇景观营造的话语转变成必然。

当代城镇景观营造的话语模式应该是什么？它应该包含一系列因素，其中地域性文化是主要因素之一。“景观”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空間环境，是各种社会生活的载体。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必然具有地域与民族的烙印，是地域文化的显像表征。因此，具有“整体性”“连续性”与“有机性”的特征。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传统基于生活的营造理念被消费社会的价值观所取代，传统的景观形式超越了生活，成为一种标示性符码，景观空间的生产呈现出“零碎化”“异质化”与“形式化”的特征。如何系统性地营造一个有机的人文景观环境，是当前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本研究以独龙江“人马驿道”景观开发为例，将“文化景观”概念引入地域性景观营造之中，通过分析总结“四步合一”的景观营造策略，对破解当代景观营造的困境提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思考。

二、基于“文化景观”视角的地域性景观营造

（一）“文化景观”的概念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是整个景观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最早被人们称为“历史景观”，它与“人文景观”具有相似的含义。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2]。由于区域内民族文化的不同，其创造的文化景观也具有不同的特征。

文化景观作为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的结果起源于人类农业生产时期，并随着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内涵与形式。可以说，文化景观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每个时代的人依其文化特征对景观施加影响。而“文化景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他关于地理学的著作《人类地理学》，第一次系统性地说明文化景观的概念。1903年，拉采尔又发表了《政治地理学，或国家、贸易和战争地理学》。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类型，以及各种人类活动的考察，强调人类活动对地理模式的影响，并提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即“活的有机物在其范围内发展的地理区域。”这个概念强调作为一种空间组织的人类社会与其物质背景之间的关系。与拉采尔同时代的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同样重视人类活动对景观形成的影响。维达尔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包括《社会事实的地理条件》《地理学的独特性质》等。他一反当时流行“环境决定论”的传统观念，针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出了“或然论”（Possibilism）。他认为：“自然环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范围，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又按照他们的需要反过来利用这种可能性。”^{[3][238]}此时，维达尔所指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所占有的“自然”，而他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自然与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这种整体性的景观研究思路，反映了研究者开始重视文化对景观形成的影响，并为后续的文化景观研究打下了基础。

此后，德国学者奥托·施吕特（O. Schlüter）于1906年与1907年先后发表了《人的地理学的目标》《人类地理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施吕特在拉采尔景观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强调人文景观是人类活动所形成的景观；同时，他基于形态学的方法指出研究必须就起源、作用与景观要素的结合等方面进行，即由历史的角度探索由“原始景观”（或“完全自然的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德国学者莱奥·魏贝尔（L. Waibels）在施吕特的基础上，认识到非物质要素，特别是经济因素对景观形成的重要性，并将其引入景观的研究系统。魏贝尔发展了经济结构与生存模式的观念。他认为文化景观的特征，既表现在其外貌之上，同时也蕴含于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法律、精神结构等人文因素之中^{[3][201]}至此，经过几代学者的发展，“景观”有了双重的外貌，一个是自然的格局，另一个是文化的格局，文化景观的概念基本成型。此后，

景观的研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可见的景观，还包括非物质性的社会文化层面。“景观”成为人类发展的“生存空间”。

进入 20 世纪以后，“景观”研究的中心由欧洲大陆逐渐转向美国。在德国与法国地理学家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进一步强调景观的文化属性。例如，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O. Sauer）将“景观”引入美国地理学的研究，并进一步转向文化景观的研究。索尔陆续发表了《景观的形态》与《历史地理学序言》。索尔将景观定义为：“自然形式和文化形式相互结合构成的区域”^[4]。索尔指出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应该为地面，包括地球上人类所能利用的一切的场所，景观由“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构成。对于景观的研究，索尔既强调人类文化对景观形成的影响，关注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他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重视人类文化对景观形成的作用，认为文化通过时间的力量作用于“自然景观”。因此，对于文化景观来说，自然景观是基础，文化是动力，文化景观是结果。索尔将景观研究的视角关注于文化景观的研究之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伯克利学派”。此后，对文化景观的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文化景观的保护也逐渐被世人所重视。

（二）基于“文化景观”视角的地域性景观营造策略与方法

“景观”是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然或人工的空间场所，包括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两个部分。其中，自然景观是基础，文化是动力，文化景观是结果。因此，通过对一个地域的文化景观的审美认知，可以了解该区域人类活动的具体特征。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来说，文化景观的营造正是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合理地营造文化景观也正是破解当前景观营造乱象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如何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具象化、表象化，形成可以观赏、体验的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营造的重点，也是主要的难点问题。

文化景观的营造，归根结底是对非物质文化的物化设计过程。设计过程可以表达为四个层次，即文化的挖掘、文化的符号化、景观功能与形式的协调、文化景观系统的展现。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历史文化元素的提取与景观要素的文化意蕴挖掘。思维是通过语言的言说来表达，同样，文化也有其潜在的言说形式。通过对地域环境中的历史文化进行解读与挖掘，提取文化要素，如民间传说、历史节庆、民族服饰等，将其具象化形成各种文化符号。

第二，历史图景与当代功能需求的协调与重构。景观作为一种空间环境承载着一定的功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空间图景与现实的需求可能存在着不协调，在景观营造过程中，需要对传统景观形式按照现实功能需要进行空间重构。

第三，文化景观系统的组织与提炼。景观作为物质空间环境具有一定的形态，这种形态具有某种内在“意识”驱动的态势特征。形态是城市景观的各个要素，如建筑、街道、广场、绿地、标志物等在空间中的集合，同时也是城市中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在空间中的投影，这种投影是时间在空间中的凝结。可以说，形态特征是城市在历史演变中最为持续的遗存，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某种“意识”将自我的特征刻入城市景观的形态之中。因此，文化景观的营造是对其所对应的社会功能的“图像”，或者说是“图景”的构建。这个“图景”是潜藏于形态背后的文化逻辑，设计时可以借助“空间句法（Space Syntax）”^①等方法来分析城镇的景观形态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

① “空间句法”理论是 20 世纪英国学者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针对如何有效分析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其中“句法”（Syntax）原指句子组合成文章的结构与规则，而空间的“句法”是指城市中景观所形成的空间的相互关系。“空间句法”是建立在图论的基础上，关于城市景观空间分析直观的、量化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城市中具体的空间进行量化的研究来分析景观的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

第四，景观空间叙事结构的展现设计。基于游客行为特征，将提取的景观元素，结合传统景观形态的内在的态势与结构逻辑，并按照一定的功能与主题在空间上进行重构，形成完整的文化展示链。

三、塑造融合与发展的地域性景观：独龙江人马驿道景观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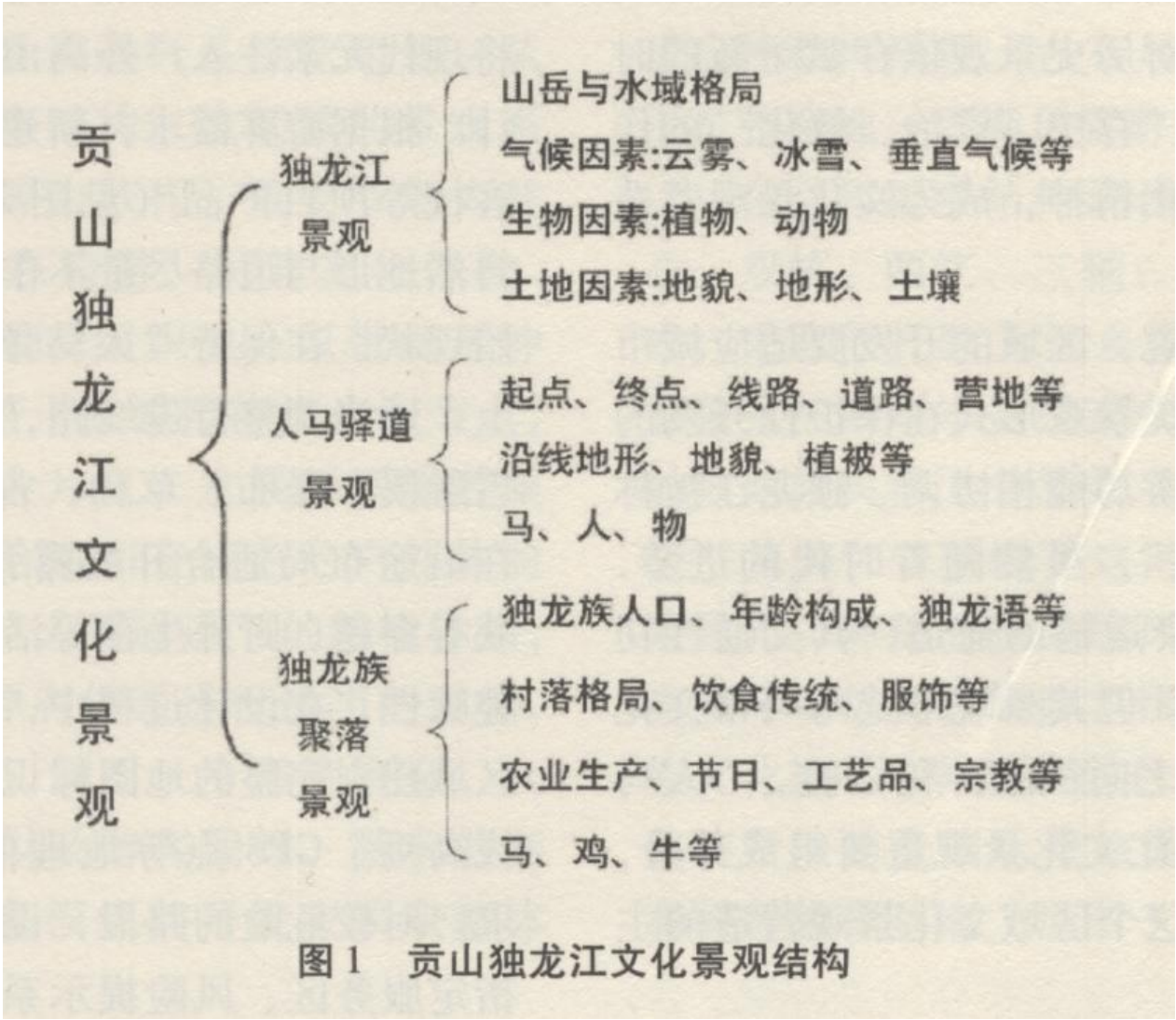
1998 年，随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最后的马帮》播出，“独龙江”“贡山”与“人马驿道”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独龙江发源于我国西藏，向南流经但利卡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峡谷，即云南贡山县地区。在这里居住着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独龙族。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这里相对封闭。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为保障独龙族人民的基本生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组建了“国家马帮”，每年运送大量物资进入独龙江流域，这条“人马驿道”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1999 年，贡山通向独龙江公路的全线贯通，“人马驿道”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进入 21 世纪，随着德贡公路修建和进藏公路延伸，借助“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和“桥头堡战略”。贡山作为国家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连接三大旅游热点地区的“黄金走廊”，以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东西连贯的交通要地，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开发前景。独龙江人马驿道景观规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了出来。

贡山县境内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人马驿道”是区域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然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旅游展示的需要是不同的，不能将其简单再现，而是要结合游客行为进行重构。在此，“四步合一”的地域文化景观营造策略对于挖掘历史景观资源、协调形式功能、形成新的景观系统具有主要意义。

（一）历史文化元素的提取与景观要素的文化意蕴挖掘

正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指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文化是零碎的、潜藏于生活之中。在此，“文化元素”是文化的基本单位。文化景观的营造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历史文化元素进行挖掘与提取，从中找出最能体现地域历史文化文化元素。生活是延续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这就决定了一个“景观”的不止包含一种文化类型，因此，其一般包含很多个文化元素，但这些文化元素必然有主次之分。文化元素的挖掘与提取并不是要对每个文化元素进行同等性挖掘，而是结合“文化景观的类型与构成要素”^②要抓住“景观”中的最重要元素，形成模块化营造。以贡山地区为例，区域内最主要提取的文化景观资源主要包括“独龙江景观”“人马驿道景观”与“独龙族聚落景观”三个模块（见图 1）。

② 相关研究与具体分类方法参见：李和平、肖竞：《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载《中国园林》，2009 年第 2 期，第 90-94 页。



“独龙江景观”与“人马驿道景观”模块：高黎贡山东靠横断山脉，北依青藏高原，是著名的板块构造结合部，其主峰嘎娃嘎普峰海拔 5100 多米，终年积雪，被当地人视为神山，至今无人登顶。高黎贡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成就了高山峡谷、雪峰冰湖、云蔚奇峰、九天飞瀑、石门关隘等独特雄伟的山地景观，这些景观特征决定了该区域的文化景观营造的基调与气质；同时，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产生了全长约 65 公里的“人马驿道”。

“独龙族聚落景观”模块：在此区域世代居住着我国特殊的少数民族——独龙族。独龙族是中国少有的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独龙族村寨是其主要生活聚居地，大多建于独龙江河谷，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独特的河谷气候和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让独龙族人民与大自然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居住的房屋大多为竹木结构，结构轻巧，取材自然，建筑与地形结合紧密，具有干栏式建筑风格。建筑室内装修简单，独龙毯是其独特的装饰物，这是一种以野生麻为原料，手工染色、手工编织的独龙族特色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景观营造的主要文化元素，在景观营造过程中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提取重现独龙族传统生活方式与聚落空间。

民俗活动方面，独龙族本民族崇拜自然物，信鬼神。由于社会和文化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把天气变化、自然灾害、疾病等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皆认为是有鬼神附着。因此，为了祈求平安、保佑亲人，独龙族有专门的巫师来负责祭祀和驱鬼活动。这些民俗文化与祭祀活动可以营造节庆活动，通过游客体验式的参与，将民族文化直观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贡山县独龙江片区资源丰富，主要涉及聚落、环境、节庆、民俗、技艺等文化类型，景观资源丰富。规划设计中结合旅游需求与空间叙事逻辑将繁杂的景观资源整合为三大模块。通过具体的游线与旅游产品设计，使其充分融入周边旅游资源板块，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辐射空间。

（二）历史图景与当代功能需求的协调与重构

“文化景观”一词由“文化”与“景观”构成。其中，“文化”具有“历史性”的意涵，而“景观”是一种功能性的场所。因此，“文化景观”强调存在于历史中具有一定功能的空间场所。在此，功能往往具有与其相符的历史语境，“文化景观”在特定的历史中具有特定的功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景观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而空间场所成为一种“形式”遗留下来。文化景观的营造不等于原地封存，开发需要对繁杂的景观资源进行整合并在保证文化意蕴的基础上，对各个模块进行功能重构。在新的历史阶段，对于这种“形式”的功能重构成为“文化景观”营造的重要步骤。作为地域性景观特征明显的区域，如何在设计中有效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景观依存赋予新的时代功能，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弘扬地方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文化景观营造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区域的开发要适应城市建设的发展速度，传统景观形式在保护性开发的同时，也要与新的旅游功能相协调。独龙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秘境”，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人马驿道”作为物资运输的通道，其交通性功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景观形式与马文化是许多户外爱好者心之向往的神秘体验。“人马驿道”作为贡山独龙江文化景观重要组成部分，是打造的重点，也是这个区域文化景观营造的主要载体。

项目规划设计上依托原有“人马驿道”的路线为基础，结合旅游功能的需要，重构其功能，将现代元素注入户外高山、森林旅游产品开发设计。根据游客需求，新建观景台、营地、生态型客栈等项目产品（见图 2）。设计中对于原有的自然地形与道路尽量不作硬化处理，以保持其原始现状。在保持“人马驿道”的原有路线的基础上，适当调整行进线路，使沿途可见冰蚀湖、冰雪融溪、瀑布、草甸、古村等自然景观；同时，在沿途布局适合开展露营、徒步、登山、攀岩、峡谷穿越、野外生存等活动的场地，增加游览的趣味性。在设计过程中，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对区域建立完整的地图标识系统，包括经纬度、海拔高度、GPS 点等地理信息，满足高端旅游需求。对较危险的路段，设登山准入制度；途中有指定服务区、风险提示系统、安全系统、环保系统和应急医疗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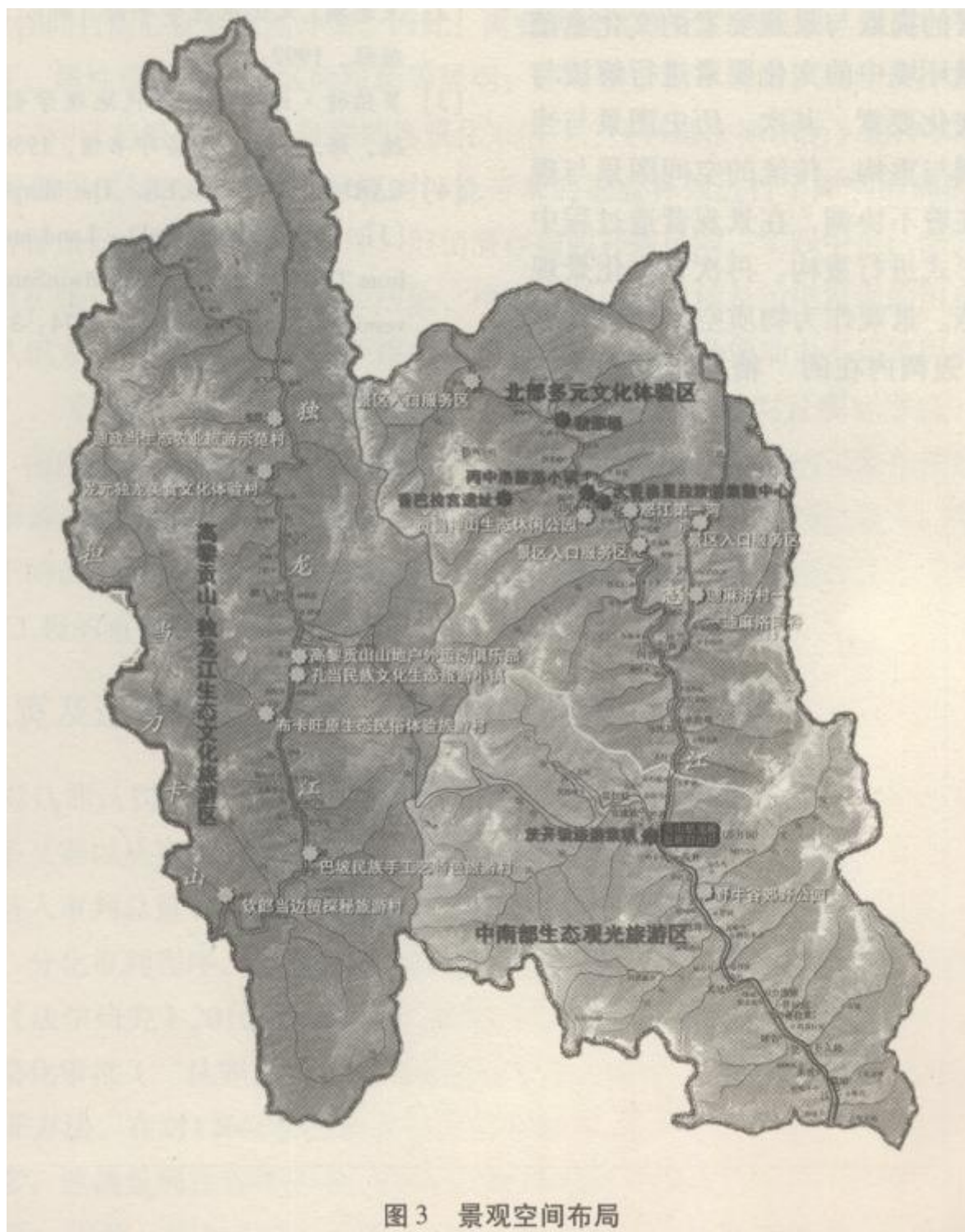


图2 营地景观设计

（三）文化景观系统组织与空间叙事结构设计如同小说的叙事结构一样，文化景观的展示也需要形成一定的空间叙事结构。景观元素就像一个个词语，需要一定的语法结构组织成为语句，从而达到表意的目的。相较小说而言，文化景观的叙事更强调空间性，它是景观元素在空间与时间两个层面的延展。因此，在设计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意涵挖掘的基础上梳理线索，将相关景观元素组织到体系化的表述结构中；另一方面，结合叙事结构整理要素的空间形态与组织关系，通过节点、游线、视觉引导等技术手段完善空间层面的表达。

对于独龙江人马驿道的设计，通过之前文化元素提取、重构之后，规划区域内的各个景观要素基本成型，接下来，需要依据开发需求与游客行为，对各个要素进行系统化组织，从而形成一定的空间叙事结构。该区域的景观系统组织主要以旅游资源为依托，重要节点为基础，其功能定位为生态旅游、民族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等。从旅游活动组织上，以带状延伸和交通为依托，构建若干旅游接待中心和节点，整体形成若干旅游产业片区。发展新型旅游服务基地、徒步营地补给站和有特色的户外体验系统。设计遵循传统“人马驿道”的结构体系，综合考虑旅游需要对原有体系进行适当的延伸，完善并丰富结构体系；同时，考虑到资金、人力、物力供给因素，以及游客偏好、需求的变化，文化景观体系内各模块的开发应采取整体规划、分期开发的序列安排，兼顾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布局规划时，应为未来留下扩张余地，以满足旅游发展新需求。

在空间叙事结构设计上，该项目提出“一心、双核、两江、三轴、三区”的空间布局形式，采取依托独龙江乡境内高黎贡山（北段）及独龙江两岸丰富的高山峡谷景观资源及神秘的独龙族民俗文化资源为核心内容的思路，围绕“隽美”“秘境”这两大主题，展示奇丽秀险风光。神秘的独龙族风情寺规划区建设成为自然环境优美，旅游氛围优良的中国独龙族民族文化探秘、体验旅游目的地，成为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全国示范旅游区，先进自然保护区和科普教育基地（见图3）。、



四、结论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之于城市就是性格与灵魂，这是一种软实力。因此，“文化引领城镇更新”成为新世纪城镇发展的主题。城镇更新从过去关注于功能与物质空间形态工程建设逐渐转变为一项系统性的文明复兴工程。在此，文化景观研究作为挖掘文化价值内涵，推进发展城镇文化发展的设计思维，在当前城镇化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是破解当代城镇景观营造乱象的一种思路，特别是处于民族地区的城镇，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这场转型中处于前沿。

贡山独龙江人马驿道景观规划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文化景观营造方法。在设计方法上主要有四个步骤：首先，历史文化元素的提取与景观要素的文化意蕴挖掘。通过对地域环境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解读与挖掘，提取历史文化要素。其次，历史图景与当代功能需求的协调与重构。传统的空间图景与现实的需求可能存在着不协调，在景观营造过程中需要对传统空间形式进行重构。再次，文化景观系统的组织与提炼。景观作为物质空间环境具有一定的“形态”，强调内在的“精神”驱动的态势；最后。景观空间叙事结构的展现设计。基于游客行为特征，将提取的景观元素按照一定的主题在空间上进行重构，形成完整的文化展示链。

目前，如何挖掘营造文化景观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传统文化的保护不等于原地封存，开发也不是无源的嫁接。文化景观的营造需要对繁杂的景观资源进行挖掘与整合，并在保持其文化意蕴的基础上，对空间叙事结构进行设计，将无形的文化组构成为一种体验式的景观系统展示予人。贡山独龙江人马驿道景观规划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了一种现阶段较为成功的模式。

参考文献：

- [1] 张熹.当代建筑艺术中的审美病态倾向探析[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2):69-78.
- [2]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30.
- [3] 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M].葛以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CARL ORTWINSAUER.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J].John Leighly(ed).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Satr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315-350.